

第一篇 导论

(一)

1996年，为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以下简称《毛诗集》)共收诗词67首。这是目前国内收诗词最多、最具权威的版本。在我们这个泱泱大风的文明诗国，当属鼎鼎盛事！令人振奋，诗坛雀跃。凡其祖武者，无不尊奉为与《诗经》同天并峙，耸入云霄的诗国奇峰，光耀中华千秋，惠及世界万代。

为祝此豪举，我们精审献给诗人百年诞辰的《毛泽东诗词史诗论》和101周年诞辰所献《毛泽东诗词美学论》为补其遗憾又精心结撰《毛泽东诗词纵横论》献给这位长眠神州、旋乾转坤、运地行天“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救世英雄和“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现代诗豪毛泽东诞辰106周年！当稿付梓，有一种特有的愉悦涌动全身。拟撷曰：千古绝唱马背吟，一百零六慰诗魂；古今大师诗国念，聊表寸心励传人。

(二)

这样做，旨在帮助那些鹄望探求毛泽东何以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历史影响，他又何以成为令敌人丧胆、令世人仰慕的

一代伟人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毛泽东，让沐浴大潮，朝气蓬勃，志向宏远，奋发有为的青年朋友不仅懂得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功德无量的、有独创精神的政治家、革命家，在多灾多难的 20 世纪的艰难岁月里，当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关头，是他领导中国人民高举革命大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一举推翻了“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世界，建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换了人间”的新世界，成为拯民于水火的“现代爱国主义”（江泽民总书记语）民族英雄。还要懂得我们的文明华夏，在古代就是声名赫赫的东方诗国。传之现代，唯一的传人代表、诗国旗手，就是独具匠心的政治家和独树一帜的诗人毛泽东，他的诗词博大精深，内容丰厚，深涵哲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丰厚宝藏。

世人共识，泱泱诗国的开元诗集——《诗经》是古代圣人孔子手辑。它是我国社会第一次大变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产物。诗国初出碧峰，2500 年后的《毛诗集》是现代伟人毛泽东手著。它是我国社会最后一次大变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渡的时代产物。诗国突兀奇峰，可谓二绝，皆为诗坛经典。犹如双星高照，光耀中华文明千秋万代。《诗经》是华夏先民精神活动的总结。《毛诗集》则是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奠基、建设、发展的艰辛历程及各界群众在这次社会大变动中的情感世界与心理状态。这一举世周知的双峰并峙的人间奇观，恰如两座丰碑矗立于绵亘 5000 年的文明华夏。丰碑所雕：古代圣人手辑诗集第一人；现代伟人手著诗集第一人。两部诗集为各自的时代标志，作者同称历史巨人，盖世大家。均独树一帜，万世经典。古今中外，世人敬仰，骚坛倾倒。

《毛诗集》通过革故鼎新，达到了时代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作者用他的生花之笔，开创了中华诗词古为今用的一代新

风 使这株诗词古树 焕发新貌 郁郁葱葱 在中外诗坛 享誉极高。居泰山北斗(郭沫若先生语)千古独步(公木先生语)是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十五大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他那光芒四射的雄文四卷异曲同工，日月并辉。是华夏儿女的两大宝贵遗产、传家之宝。如欲取其真谛，需读大部头的现代史书或请现代史教授讲几天大课。为便于青年朋友对此有个轮廓的了解，特从现代革命史中撷取二段，可用史实、史文、史诗三位一体的读法，从历史轨迹中悟其一斑。

(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当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以及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农民问题、党建问题等重要主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为总方针。这个方针，是付出了大量鲜血代价换来的正确结论。“八·七”会议，给大革命失败后，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组织秋收起义。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1927年9月9日震动全国的秋收起义正式暴动。起义军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派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军遭受严重挫折。这时，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毛泽东，看到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确定的夺取

中心城市(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便当机立断改变原来的部署,决定离开浏阳地区,尽快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即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早已派人同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取得联系。10月7日他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后,革命部队壮大,力量增强。在此基础上,先后成立了湘赣特委和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特委和边界政府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展了土地革命,加强了民主政权建设,在广大革命队伍中点燃了新的希望之火。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沿着一条独特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一步步地走向胜利。这条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发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还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独到、精辟的阐发。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创造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四)

为了从理论的高度总结这一独特创造的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

革命道路的经验，毛泽东在行军、战斗间隙，花气力用功夫先后写出了 10 篇对全国革命乃至对世界革命有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 3 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 12 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 年 5 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 年 8 月 12 日）《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 年 10 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 年 1 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 年 1 月 27 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1927 年的春天，反动派军队剑拔弩张，形势已很严峻。当时农村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毛泽东到湖南农村去做了 32 天的调查研究并向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支持已经起来的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最后导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几篇文章都是围绕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斗争、发展、胜利及其伟大意义阐发的。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文章谈了六个问题：（一）国内的政治情况（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四）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五）经济问题（六）军事根据地问题。特别是在第二部分精辟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五个原因和条件。《井冈山的斗争》重点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最后指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

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历史证明，大革命失败后，在周围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仅能坚持下来，并且能得到很大发展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井冈山的斗争，集中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对此，毛泽东在上面几篇文章中已经阐述得非常透彻。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对工农革命的要求，改变了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工农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绩，鼓舞了革命阵营，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1928年下半年反动军队屡屡进犯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这时国民党调动六个旅3万多人，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前委和边界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由彭德怀等同志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坚持斗争，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陈毅于1929年1月率一部分红军主力向赣南出击，这里党和群众基础较好，而且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发展游击战争。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历经艰难，多次受敌人重兵袭击，屡陷险境。1929年2月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战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大部，这次大捷后扭转了红军被动局面，接着又灵活地使用兵力，多次歼敌取胜，1929年4月，又与红五军主力在瑞金会合。抓住战机连告大捷，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1年1月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

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为中央军委主席。同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瑞金。这一时期，毛泽东指挥红军粉碎了反动军队对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大“围剿”的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因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强调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失败。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他吸收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他先后又增调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步步推进。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有8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增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只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负责军事指挥。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的经验，但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前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的方针提出“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北上应敌，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入被动地位。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当时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即曾在上海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在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

主权利；（三）立即武装工农大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这是个有重要意义的宣言，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由于红军坐失了这次良机，蒋介石便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得以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结果是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并且最终导致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五）

以上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在毛泽东上面10篇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深刻的总结和精辟的阐发。与此并驾齐驱的还有13首大气磅礴的中华古典诗词，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这段史实。根据组诗的原则要求，这13首诗词可称“井冈组诗”。按其内容和写作时间，又可分为三部分，借用戏剧术语可表述为：

一、序幕二首

（1）《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2)《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所以把这两首词作为“井冈组诗”的序幕，主要是根据作者对《菩萨蛮·黄鹤楼》的自注：“一九二七年 大革命失败的前夕 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 八月七号 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从史实看这个自注，牵涉到这两首词的前前后后。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革命阵营分裂的趋势开始明朗化。当时这一地区工农革命运动十分高涨，蒋介石要是在江西遭到失败，将难以立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敢采取重大行动。到孙传芳主力在江西被击破后，局面顿时发生了变化。身在南京的蒋介石明白：这不仅是江西局部的胜利，而是整个东南半壁的胜利已经在望，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已全然改观。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北洋军阀的势力会崩溃得那么快，帝国主义列强是没有预料到的。它们那时已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积极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英国在富庶的长江流域享有的特殊权益最多。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一

再寻衅，制造事端，借故炮轰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伤亡军民 1000 多人的万县惨案。接着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达到 63 艘，在上海集结的外国军队增加到 2 万多人，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 总数达到 3 万人以上。它们企图以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它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不可避免，便着重对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工作，扶植自己的新的代理人。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是日本。1926 年底，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武汉、南昌并会见蒋介石后，回国报告：在南昌和武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后裂痕将难免日益明显。1927 年 1 月蒋介石会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时，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保证承认外国对华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在华的特权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把蒋介石看做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 对他进行拉拢 认定蒋介石“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这样一来，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一批政客、官僚也从北方来到蒋的身边，其中包括同蒋私人关系极深的黄郛。他南下途经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蒋介石可透支 100 万元。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在这个背景下 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1927 年 2 月 21 日蒋介石在南昌演讲公开反共 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党员有问题 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和权力”。3 月 6 日他指使国民革命军驻江西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 月 10 日至 17 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开会，由于武汉的一些国民党领导人不愿意蒋介石一人独裁，所以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只通过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且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撤消蒋介石担

任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但由于蒋介石仍然掌握军事大权，所以他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3月16日他从南昌到九江，指使青红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打死打伤多人，接着他又乘军舰去安庆。3月23日他又指使暴徒捣毁安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针对这些暴行，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于4月9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长篇文章，列举了事实后指出：“蒋介石已不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他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事实证明，“蒋介石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对此党内有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较早觉察到这种危险，192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准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应当竭力防止大的斗争之发生。同时极力准备整个大暴动的力量，要能有此伟大的力量。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则认为这些看法是“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要求加以纠正。”陈独秀还直接找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这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1927年1月至2月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考察。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3月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在《战士》周报上发表，报告中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陈独秀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1日汪

精卫与蒋介石密谈后，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使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放松了警惕，误认为局势已经缓和。不久陈独秀又与汪精卫一起前往武汉，并把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办公。《菩萨蛮·黄鹤楼》就是在上述情况下问世的。过去诗坛前辈多讲诗有诗眼，《菩萨蛮·黄鹤楼》的诗眼是“心潮逐浪高。”其意有五层：一是触景生情，当作者登上鹤典历代盛传的黄鹤楼时，面对东去的滔滔大江联想到他曾批阅过、手书过的有关“鹤典”的诗词（从毕桂发先生主编的《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全编》中看就有十几首），我也赞成有的学者认为作者联想到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屈指算来作者当时联想到的诗词中有不少如同“伤心碧”“楼上愁”“漠漠烟如织”“何处是归程”的辞句。作者所思不是古人为岁月流逝的悲叹，而是对革命历史的沉思，这沉思随着涛涛滚滚的江水而逐浪攀高，这是一个一心拯民于水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心潮，历史情怀。二是作者刚在湖南农村，对农民革命的大好形势进行过深入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作者和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昂斗志联在一起，而心潮随着江水涛涛而翻滚。三是更联想到当时中央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把农民革命斗争的热情指责为“过火斗争”，仍视对工农革命磨刀霍霍的蒋介石为“革命领袖”的现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不“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四是联想到党中央即将召开的事关革命转折点的“八·七”紧急会议，毛泽东怎不心潮澎湃？在会上他将要系统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要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党建问题。想到这些作者怎不伴随着涛涛江水而“心潮逐浪高”？五是根据“茫茫九派流中国”的辽阔幅员和“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回旋余地，作者自然想到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分析的五个条件，指出

“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就是当时盛传很广的革命歌谣：“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自然与滔滔大江东去入海，构成了诗人的百川可以汇成大海的心潮。由此可见毛治中先生说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是千古绝唱，又是革命誓言。可谓真知灼见。要真正解其意，悟其道，尚需重温《西江月·秋收起义》问世前后的时代背景。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分化的危险。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正如毛泽东 10 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面对着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不这样做，只能是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问题是：在这样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如何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如何进行武装抵抗？

当时，全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纠正党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着重指出他完全放弃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等等；“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党在付出大量血的代价换来的正确方针。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突出强调：“以后要非

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帮助省委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暴动问题，一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是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只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想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省委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和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 共约5000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最初仍以当时中央定的目标夺取中心城市长沙。毛泽东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现，便当机立断改变原来的部署，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9月19日前委开会决定迅速离开平江、浏阳，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秋收起义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前委决定将原来的师缩编为团，将党支部建在连上（一直沿用至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官兵一律平等。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派人同井冈山的农民武

装取得联系。 10 月 7 日他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就是“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的真谛。

二、主题八首

- (1) 西江月 · 井冈山(1928 年秋)
- (2) 清平乐 · 蒋桂战争(1929 年秋)
- (3) 采桑子 · 重阳(1929 年 10 月)
- (4) 如梦令 · 元旦(1930 年 1 月)
- (5) 减字木兰花 · 广昌路上(1930 年 2 月)
- (6) 蝶恋花 · 从汀州向长沙(1930 年 7 月)
- (7) 菩萨蛮 · 大柏地(1933 年夏)
- (8) 清平乐 · 会昌(1934 年夏)

1962 年 4 月《词六首》引言中说：“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①词六首是指蒋桂战争、重阳、广昌路上从汀州向长沙和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最后两首我把它作为“长征组诗”的序幕。这里只录四首，加上了 1928 年写的《西江月 · 井冈山》和 1930 年 1 月写的《如梦令 · 元旦》，1933 年夏写的《菩萨蛮 · 大柏地》，1934 年夏写的《清平乐 · 会昌》。

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发展巩固起来以后，反动派非常恐慌，多次调兵遣将进犯井冈山，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多次周旋，连续击破敌军三次“进剿”。1928 年 7 月彭德怀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后组成红军

第五军，与敌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12月到井冈山会合，井冈山三支部队会师以后，力量壮大。足以对付反动军队的进犯。这时红四军、红五军和边界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程子华指挥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于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赣南地区的条件更便于红四军发展。这里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发展游击战争。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已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团，并在吉安的东西固建立起小块苏区，反动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而且主要是外省军人，同本地豪绅关系不很密切。这里距大城市较远，交通不便，敌军往来聚集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最初经历非常艰难，由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又受敌军重兵尾追袭击，屡陷险境。1929年2月，他们在瑞金大柏地打了一次伏击战，歼灭紧紧追来的敌军一个旅的大部。这次大捷，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随后又挥师北上到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先后利用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向闽西急进。3月在长岭寨歼敌一个旅，又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大批武器给养，接着回师赣南。4月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红四军乘福建军阀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西进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配合下，歼灭敌军两个旅。这时赣西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这里的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1929年2月大柏地伏击战大捷是红军第四军下井冈山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及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关键的一仗，意义深远。因此，1933年夏天毛泽东再次路过这里，一向激情满怀的毛泽东自然触景生情，抚今追昔，挥笔而就这一千古绝唱，既是

回忆往事，又是展望前景，更是抒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感慨！这里表述的正是诗人政治家对革命战争胜利的信念和乐观主义情怀。当他重新踏上“今朝更好看”的大柏地时，他已被解除军内职务，又加染病在身，自然百感交集。然而，我们饱览词中的情怀，感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立场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心。由此得知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不为个人得失牵累，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人民群众总是一往情深。因此，当看到大柏地四年后的新面貌时，诗人即兴高唱：“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个“更好看”当含三层意思：一是欲知“今朝更好看”必懂“当年鏖战急”；二是不懂“当年鏖战急”就很难理解“今朝更好看”；三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要问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应该到大柏地来看一看，从实践中领悟一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哲理！至于这首词如画的意境，前辈学者释述备矣！这里只想就“谁持彩练当空舞？”说一点感悟，不当处请前辈教正。此问颇有奇意。奇一，此为全词重笔所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不应来看一看“今朝更好看”的大柏地吗？奇二，“今朝更好看”的大柏地，不正是“当年鏖战急”时红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结果吗？奇三，实践证明，只要团结一心，坚持这一时期红军作战实践经验形成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运用这一适应当时当地情况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我们就能做到“横扫千军如卷席”，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结果必然是“风卷红旗过大关”，“风景这边独好！”

三、尾声二首

1.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2. 《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这两首词在同一时期写成。其背景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